

# 賈著「鮑羅廷」評介

蔣 永 敬

書名：*Borodin—Stalin's Man in China*

著者：Dan N. Jacobs

出版：Harvard University, 1981

頁數：正文 327 頁，另主要資料、附註、索引計 41 頁，另有插圖 11 幅。

定價：美金 25 元。

## 一、介紹部分

本書著者 Dan N. Jacobs（以下稱著者），為美國邁阿密大學（Miami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發表過的著作曾有：*The Fourth Wave, From Marx to Mao and Marchais*，以及 *Ideologies and Modern Politics*。著者的訓練，顯然偏重於政治學方面的研究。本書「鮑羅廷」，則着重於史事的描述及分析，企圖對鮑羅廷一生的歷史，作一全面的透視。鮑羅廷的一生事業，堪稱「輝煌」者，應是在中國的一段時期（1923-1927）。前後雖然不到四年，但在本書的內容上，卻佔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本書的重點，為探討鮑在中國的活動。主要任務，是執行史大林對華的政策，故其副標題稱為“Stalin's Man in China”。

本書除簡短的序言外，計分為十九章，其中有關在中國方面活動者則有九章。各章內容要義如下：

1. 出生於巴勒(Pale)：巴勒位於俄國西部猶太人集居的地區。在沙俄時代，猶裔的俄人，倍受歧視與虐待；甚至遭受大量的屠殺。猶人為求脫離苦海，無不夢想逃出俄境。其留在俄境者，在十九世紀的末期，由四百萬減至二百萬人。這些猶人，雖多夢想逃出俄境，亦有寄望於民族主義及社會主義者。當時對猶裔俄人影響最大的團體，為猶人工聯總會（the General Jewish Workers' Union），或稱「同

盟」(Bund)。

「同盟」為一些知識份子所創設，1897年成立於維爾納(Vilna)，彼等信奉傳統的馬克思社會主義。其最初的領導人非遭監禁，即告逃亡。其會員大多為猶籍的技工，在「同盟」的組織指導下，給予猶籍工人以組織的經驗；而其最精的技巧，則是偷運非法的人員及物資出入邊境。

1900年，「同盟」在俄國算是最大的社會民主組織。是年在巴黎舉行的第二屆世界大會，俄國出席代表三十人，其中有十一人代表「同盟」。該「同盟」熱心支持猶籍工人階級，以助其政治意識之發展。鮑羅廷即於此時加入「同盟」，年方十六歲。

加入「同盟」以前的鮑羅廷的歷史資料不多，根據有限的記載，鮑於1884年7月9日生於Vitebsk省的Yanovichi，三歲時移居拉脫維亞(Latvia)，曾就讀俄文學校。青少年時期，做過船伕，航行於杜味那河(Dvina)，最後決定居留拉脫維亞的首都——里加(Riga)。在碼頭做工，並就讀夜校。

列寧早年革命時期，曾一度利用「同盟」，後又反對之。1903年，鮑羅廷脫離「同盟」，加入列寧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布爾什維克派(Bolshevik faction of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成為列寧的忠誠的擁護者。鮑時年19歲。有三年在「同盟」活動的經驗，且在碼頭工作，有偷運的便利與經驗，故為列寧所需要。1904年的下半年，奉列寧之命前往瑞士，聽候列寧的指示。未久，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沙俄冬宮廣場工人請願，發生流血慘劇，是為1905年1月9日的「血紅的星期日」(Bloody Sunday)。消息傳至流亡在瑞士的革命黨人，為之興奮不已。鮑是首批派遣回俄工作者之一。他回至里加，與當地的各黨派包括「同盟」、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Menshevik)、布爾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以及反戰的組織Kadet等團體代表，成立了里加聯合委員會。鮑代表布派，並擔任聯合委員會的三人秘書之一。此時鮑在里加的革命活動中，已經顯露頭角。實際學得統戰的經驗。

**2. 1905年的革命：**1905年，沙皇政府頒佈「十月宣言」(October Manifesto)，對反政府者表示讓步，使得許多革命的組織可以公開活動。列寧即於是年十一月回到聖彼得堡。這年十二月，莫斯科又發生工人示威，此時布派黨人正在芬蘭的坦慕福斯(Tammerfors)舉行會議，消息傳來，會議通過一項決議，號召立即組織一項全國性的武力暴動。遂即休會，俾與會代表返其革命的崗位，執行任務。

在這次會議中，鮑羅廷與全俄布派首要相聚一堂，檢討過去的工作與今後的計劃。會後即回里加。當其到達里加時，十二月的暴動雖未燃起革命之火，但確信革命時機並非遙遠。鮑銜其黨的使命，於 1906 年三月參加拉脫維亞社會民主組織的春季會議，討論與俄國社會民主黨派的聯合事宜。四月，俄國社會民主黨在斯多哥爾摩（Stockholm）舉行統一大會，參加者為布派及孟派的兩方要員，鮑以里加布派的代表資格出席，會中兩派發生激烈的爭論，布派居於劣勢。在這次大會中，鮑結識極多的重要革命黨人；尤其重要的，鮑不僅與史大林鄰坐，且在十八次的表決投票紀錄中，鮑投列寧十一次，投史大林十四次。在上次的坦慕福斯的會議中，鮑與史大林已經相識，這次再度同會，對其後來的命運極有關係。

斯多哥爾摩會議，對於鮑在布派中的地位，頗有增進。彼時雖年僅二十一歲，但其表現極為傑出。

3. 新世界：鮑羅廷於 1906 年五月由斯多哥爾摩返至里加時，卻發現已被秘密警察追蹤。遂即逃往聖彼得堡，仍被拘捕。在選擇放逐地區時，鮑選擇前往歐洲。十月，到達倫敦。1907 年初至波士頓。停留約有一年。1908 年初，轉往芝加哥，此為美國社會主義者的中心。遇到一位來自維爾那（Vilna）的女士名叫法尼亞·阿魯克（Fanya Orluk），遂結為夫婦。是年夏，鮑入法爾帕萊梭大學（Valparaiso University, Indiana）就讀。第一學期的選課有修詞學 1、速記法 1、辯論術 1；第二學期選辯論術 2、打字 1；第三學期僅選地方政府一科，第三週後未再返校。鮑在法大所選讀的學科，顯為今後的職業作準備。因此，鮑離法大後，即在芝加哥辦起補習班來了。他擇居在芝加哥的 Hull House，這是專供外來移民的寓所，可謂五方雜處，常被視為犯罪者避難之所。鮑氏寓於斯教於斯，初教外人的英語，開始只有四名學生，由於教學的成功，學生增多，班次擴充。是年夏，鮑邀其法大的朋友克萊斯諾（Henry Krasnow）合資辦一所夜間補習學校，是一所八間平房的學校，位於芝城俄籍猶人的中心區，初有學生四十名，人數迅即增加。但兩年以後，鮑之學校漸入困境，由於罷工的原因，因多數學生屬於工人階級，無法繳付學費，在一百三十名學生中，僅有四十名負擔起學費。1912 年工潮平息，鮑收購另一補習學校與其原校合併。不久，鮑之合夥人克萊斯諾退出，乃由鮑獨資經營，其學校名稱用鮑的個人名義。其場地及設備均大有改善。

鮑在芝加哥雖然忙於辦補習學校和賺錢，但並未忘記俄國及革命。當鮑到芝加哥時，該地雖無俄國社會黨的固定組織，但也有些社會革命黨人及社會民主黨人在

那活動，甚至也有其他團體。但第一個「常設的」(Permanent) 俄國社會民主組織則於1909年八月二十一日在芝加哥的 Hull House 設立，定名為俄國社會黨第九支部 (the Russian Socialist Branch of the Ninth Ward)。初有會員十名，三個月後，會員增加一倍。該支部的負責人為 Michael Altshuler。著者推測此人即是鮑羅廷。但第九支部內部旋即發生分裂。稍後即有布派第四支部 (Bolshevik-leaning Fourth Branch) 之建立。鮑是這個組織的經常演講者及主要發動人之一。此一組織的領導份子最關切者為俄國問題，對於列寧主義的排他性，頗有反對的傾向。鮑氏便是其中之一。

4. 決定的邊緣：第一次大戰爆發，歐洲的社會主義陣營遂即分裂為三個主要的集團：一派屬於所謂「社會愛國主義者」(Social Patriots)，支持民族的戰爭；一派屬於「社會和平主義者」(Social Pacifists)，不支持任何一方；一派屬於列寧的集團，主張將戰爭轉變為一項階級鬭爭。其時美國尚未參戰，孤立主義氣燄正盛，其社會主義者均傾向於和平主義者。在芝加哥的俄國僑民，確信只要沙皇失敗，他們同胞的地位即可改善。

其時列寧流亡在瑞士，獲知美國人民的反戰情緒。為了爭取友軍，乃於1915年派了一名代表前往美國宣傳反戰及籌款。他派了一名貴族出身而善變的女士，名叫柯隆太 (Alexandra Kollontai)，一位沙皇將領的妹妹，出身於烏克蘭的貴族，提倡「杯水主義」(drink of water)。在美旅行四個半月，走遍八十個城市，演講123次。十月間到芝加哥，停留五天，與鮑會晤，恢復了鮑與列寧的聯系。但鮑仍繼續其獨立的路線，尤其在俄國二月革命爆發後為然。

二月革命發生後，流亡在國外的布派革命首要如列寧及托洛斯基 (Trotsky) 等，均迅即回到俄國。但鮑之情況，則有不同，鮑居美國已有十年之久，不僅有了事業基礎，而且有了美滿的家庭——太太和兩個男孩，頗難拋棄一邊而逕自回國。但國內的革命消息傳來，所有僑居海外的俄人，無不大為振奮，紛紛開會慶祝。此時 (1917年三月) 鮑亦宣佈成立一個啟蒙社 (Enlightenment Society)，在其學校中設立總會。四月，又組織一個俄國革命援助會 (the Society for Aid to the Russian Revolution)，鮑為此會發起人之一。當舉行首次會議時，即發生激烈的爭論，究竟是支援接替沙皇政權的臨時政府？還是支援潛伏的蘇維埃組織？兩者相持不下。鮑被指定為一項委員會的主席來進行調解。結果此會分裂為二。少數支持蘇維埃，保持原來的會名；多數支持臨時政府，乃改組為俄國民主之友 (the Friends of

Russian Democracy)，鮑被選為會長，以其老友克萊斯諾（Krasnow）為書記。

八月初，臨時政府駐美大使巴克邁的夫（Boris Bakhmetiev）來芝加哥宣慰俄僑。為表示擁護臨時政府，鮑出面負責籌備一項盛大的歡迎會，被邀約參加的人員和團體，從急進的左派到保守的右派，都在被邀之列。不意在大會之際，發生強烈的衝突，大會草草結束。鮑氏深為失望。

俄國十月革命發生，列寧的布派取得政權，鮑陷於左右兩難之局。但考慮未來，必須重返布派。乃與布派在紐約的地下組織取得聯繫，作回俄之安排。

5. 回俄：鮑羅廷懷着複雜的心情，於1918年七月離開美國，於八月二十日抵達莫斯科。由於列寧亟需了解外界的情況，以及蘇俄革命情勢的惡劣，故鮑抵莫斯科不久，即被列寧召見，並付予任務。要其儘速返回美國，傳達他的「告美國工人書」。九月中，鮑經奧斯陸（Oslo），遇到十多年前的同志特文（P. I. Travin），乃將此文件交與此人，設法使之偷渡入美。鮑本人仍留斯干的納維亞（Scandinavia）地區。其主要任務，是向國外輸送人員、金錢及宣傳品。

鮑在斯干的納維亞的活動，顯有很好的表現，贏得布派的重視。此一經驗，對於鮑以後被派從事國際的活動，極有關係。當鮑於1919年初返回莫斯科後，適逢第三國際的籌劃與召開，鮑雖非代表，但卻參與內部的工作，故在會後即被派往國外活動。

6. 共產國際的代理員：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後，鮑羅廷即被列寧派往美洲工作，任命為駐墨西哥的領事。取得墨西哥駐俄總領事館發給的外交護照，並獲美駐莫斯科領事館的簽證。乃於1919年四月十八日離開莫斯科，經由德國、瑞士，沿途均有所活動。但其重要任務之一，則為設法偷運價值五十萬美元的珠寶前往美國，以供蘇俄對美的活動經費。當船抵加勒比海（Caribbean）時，即被美國海關人員帶往海地搜查。鮑在緊急關頭，將其攜帶的珠寶箱交給一名奧地利籍的退伍青年軍官，囑其登岸後將此箱交給他在芝加哥的太太。鮑之身份，已引起美國方面的懷疑，當其抵達紐約後，美國聯邦調查局即派一名情報人員斯破藍斯基（Jacob Spolansky）加以盤查。此人乃俄裔美人，在芝加哥時，即對鮑的身世知之甚詳。鮑被允往芝加哥探望其妻子。惟仍由斯破藍斯基予以監視。鮑去芝加哥另一目的，當為安排接收珠寶事，但無結果。九月，鮑偕同一名墨裔的青年邁倫（Raphael Mallen）往墨西哥。其任務為：評估墨西哥的革命潛力，組織一個共產黨，建立蘇俄與墨西哥的外交關係。

鮑至墨西哥後之首要活動，即在尋求與結識同情份子。首先結識了幾名左傾份子，有顯邁子 (M. Gomez)、高德 (Mike Gold) 以及費力浦 (Charles Phillips) 等；進而認識印度籍社會主義者羅易 (M. N. Roy)。尤其後者對鮑在墨西哥的活動，提供了最大的協助。羅易不但在金錢上給予鮑的幫助，而且在人事關係上也使鮑獲得最大的便利。在羅易的協助下，成立了墨西哥共產黨。此為在蘇俄境外第一個共產黨的建立。鮑也因羅易的安排，與墨西哥總統卡戎沙 (Carranza) 在一次晚宴中，交換意見。卡戎沙為一反美主義者，向鮑羅廷表示，甚願儘速建立墨俄外交關係，並交換大使。

1919年十二月，鮑偕顯邁子赴西班牙。次年初，參加在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之共產國際西歐局會議，與會代表被當地警方拘捕並驅逐出境。鮑與少數代表仍潛留下來，完成會議後，偷渡至柏林。五月初，回到莫斯科。

7. 地下組織：1920年春，鮑羅廷返莫斯科，可謂歷經艱險，聲譽因之鵲起，為列寧所欣賞；但亦引起一些妒嫉。時值共產國際二次大會，鮑更顯得重要而忙碌。以鮑在國外新近的經驗，所提出的報告，受到各方的矚目與重視；來自各國的代表，有的出於鮑的推薦，有的與鮑相識，彼等在莫斯科的活動，須賴鮑的指導與安排，特別是列寧的召見，多賴鮑之聯繫與安排。此外，鮑之另一重要職責，為參與翻譯列寧向大會提出的重要文件，其中最要者，為列寧所撰「左派的幼稚病」(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ease) 小冊子，告知西方國家的共產黨，特別是英國和德國等國家的，為了適應新的情勢，現在必須學習退却；必要時，亦須妥協；當直接進攻不能成功時，必須利用其他途徑。鮑氏參與此項文件的翻譯（由俄文譯為英文），不僅表示他可參與國際的秘勿，而且此一策略對於鮑之以後的工作方法，深具影響。

為了執行共產國際二次大會的決策，會後鮑被派往柏林。此時的柏林，實已成為莫斯科以外的向外擴展地下組織的中心，為蘇俄對外交通的總部。鮑氏掌理此一中心，遣派與佈置工作人員前往各國進行滲透與顛覆的活動。

8. 派往英國：1921年二月，鮑由柏林回到莫斯科，為了前次偷運珠寶赴美迄無下落事，頗受盤查。不久鮑妻法尼亞 (Fanya) 自芝加哥來信，告知已收到該批珠寶。此案始了。

是年英國經濟恐慌，發生工潮，共產國際負責人之一拉狄克 (Karl Radek) 需人協助處理有關英國的革命情勢，乃指定鮑氏任之。鮑之表現，深受拉狄克與列寧

的欣賞。

1921年秋冬之際，在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之後，鮑在「共產國際」上連續發表文章，對於英國工人的革命，持以樂觀的看法，對於英國的共黨及工人運動，提出批評與指導的意見。鮑此時儼然以英國問題的專家來指導英共。1922年初，遂被派往英國，指導英共的改組。同時與英共墨非（J. T. Murphy）安排一項廣大的考察計劃，考察南威爾斯地方的工會。但鮑之活動，已為英國警方所注意。八月二十二日下午，當鮑抵達格拉斯哥（Glasgow）時，英警隨即採取行動。是日晚，五十三名偵探突襲蘇格蘭工人學院（Scottish Labor College），發現十九名男女在一會議室中，其中有鮑氏（化名 George Brown）及墨非，當即被捕。鮑被捕後，堅不承認為俄國人，仍被判刑六個月。到了第二年（1923）二月二十日服刑期滿，驅逐出境。

9. 去廣州：本章首敘中國的情況及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歷史，繼述蘇俄迭次派人來華之考察以及蘇俄代表越飛（A. A. Joffe）與孫中山先生 1923 年一月在上海之協議的經過和內容。在上述背景下，鮑被俄共中央派遣來華擔任孫先生之顧問。

分析鮑之被任為孫先生的顧問之原因時，其中最為特出的一點，是著者根據 Ogonek 的一位記者於 1927 年訪問鮑氏時，告以彼早年在美國時曾與孫先生會晤過；又據鮑氏之子諾曼鮑羅廷（Norman Borodin）的一篇文章，亦相信其父早年在芝加哥時即認識孫先生。但此一說法，在孫先生的資料中，從未提及。

就鮑之過去工作的範圍言，偏於美國、歐洲、拉丁美洲，甚至印度，但甚少與中國有關。惟與鮑氏同時來華的加拉罕（Lev Karakhan），則為中國問題的老手。加被派在中國北京，與軍閥控制下的政府打交道，可就近對鮑提供意見。惟兩人之任務顯屬相反，加拉罕以公開的身份致力於北京外交的承認，鮑以隱密的地位致力一項顛覆的運動以反北京政府。兩人結伙來華，頗具諷刺的意味。

鮑至華南的使命與孫先生的需求並非完全一致。孫先生所需求者，為實行北伐以統一中國，故需蘇俄提供物資的援助以增強其兵力；鮑則認為在北伐之前，尚須進行很多的工作，如國民黨之重建、革命軍之成立、軍官學校之創辦。這些工作的完成，須從組織羣眾入手，一項社會與經濟的改革計劃應付諸實施。但孫先生並不同意。因此鮑之首要工作，在能如何取得孫之信任。當鮑初抵廣州時，雖然受到孫先生之熱烈的歡迎，但對其使命並非無所懷疑；同時鮑所遭遇的反對，非僅來自孫先生的左右，甚至中共方面，亦並不完全贊成莫斯科與孫先生的合作。故鮑當時之處境，可謂相當的艱巨。

鮑爲達成莫斯科共產國際的使命，無不利用一切可資利用的時機，來設法影響國民黨的政策。這一時機終於到來，那就是1923年十一月中，當陳炯明的叛軍進犯廣州的緊急危機中，鮑在國民黨廣東省支部的委員會上提出農工法案，包括土地的沒收與分配、工人工資的提高與工時的縮短，藉以組織農工羣眾來保衛廣州。當孫先生聞知此項法案已爲省委會同意時，頗感困擾。鮑曾尋求孫先生簽署此一法案，孫避之。鮑竟直接尋求省委會的簽署，亦被拒絕。

十一月十八日，叛軍已進入廣州市郊，孫先生曾作出走的準備，爲鮑所勸止。迨叛軍退，廣州轉危爲安。由於鮑氏此一建議，大大地增進了孫先生對鮑的信任，鮑之權威亦因之提高。彼所提出的國民黨改組計劃，亦積極付諸實施。

總之，十一月十八日之事，提升了孫先生與鮑及莫斯科的關係，使鮑在廣州的任務，趨於順利。

**10. 從事佈署：**改組後的國民黨，在功能方面已有顯著的改進。爲執行國民黨一全大會的決策，在國內的主要的人口中心，均派遣代表，建立國民黨支部，鮑亦於1924年三月前往上海，指導國民黨的改組。唯較有效能的地方組織，大多操諸共黨份子之手。

黃埔軍校的建立，實爲國民黨此次改組後的重要設施之一。著者對此校創辦的緣起，蔣中正先生赴俄考察的目的與經過，自俄回國後滯留上海的原因，最後赴粵出長軍校，以及軍校教育的內容及其影響，作一詳細的敘述。

國民黨之改組與黃埔軍校之設立，使廣州之革命景象，已具規模。鮑爲達成使命，從不放棄爭取孫先生的支持與合作。爲此，鮑乃安排國民黨一全大會選舉孫先生爲國民黨的永久總理。

著者以爲孫先生在某些觀念上，頗受鮑之影響；鮑爲達其目的，亦不斷對孫進行說服的工作。鮑需要孫先生，孫亦需要俄國的專家與軍備，兩者有相似的短程目標。儘管孫先生對於俄國始終持以懷疑的態度，但對鮑氏頗予信任。

鮑雖以孫先生爲其『王牌』(trump card)，但非唯一的王牌。中國青年學生對中國近代革命運動深具影響，亦爲孫先生革命運動中最強有力的支持者。鮑亦利用孫先生的關係與聲望以爭取之，其重要手段之一，即稍後在莫斯科成立孫逸仙大學。

指揮中共份子在國民黨的活動，也是鮑對國民黨工作的重要憑藉。惟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對於莫斯科的路線，頗有抵制；在廣州的中共人員及其組織，在鮑



之指導下，聽命於鮑。

關於農工，鮑亦視為潛在的支持者。因此鮑氏力促孫先生及國民黨一面改進工人的待遇，同時實行土地的沒收與分配，孫先生未予考慮。由於鮑的堅持，國民黨中央農民部以及農民狀況調查委員會，在1924年先後成立，而以鮑為顧問，其工作人員，大多為中共份子。此外又成立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孫先生曾親往演講。著者指出孫先生講詞的原意，在強調和平解決土地問題，而不主張使用沒收的手段。

11. 第一步：莫斯科對廣州的計劃，是希望在北伐之前能有一個整備的時期。但孫先生急於北伐，因此需款孔亟，乃不得不向當地商人加稅。同時由於當地軍隊各據一方，亦向商民抽稅，故廣州革命政府所得之稅收極為有限。由於征稅的原因，造成商人對革命政府的不滿。而廣州商團事件，即在此背景下而發生。

由於革命政府沒收商團自國外運進的大批槍械，商團於要求發還槍械未遂之後，即於1924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廣州開始總罷市。鮑亦乘此事件介入其間，勸請孫先生頒布戒嚴令，警告所有罷市商店將予沒收，禁止貴重物品出境，並要求號召全省農工反對商團。此時英國方面出面干涉，警告廣州政府不得壓制商團。

正當廣州商團事件緊急之際，北方發生了第二次直奉戰爭，孫先生決定督師北伐，以與其軍事盟友奉軍配合作戰，鮑氏反對，勸孫先生勿離廣州。但孫先生仍北上督師韶關。

十月初，俄船 Vorovsky 號載運大批軍械來到廣州，孫先生命黃埔軍校蔣校長將此批軍械運往韶關前線，但未能如願。著者認為係因俄國人的阻止。同時孫先生亦數次命令蔣校長捨棄黃埔，將軍校官生及裝備移往韶關，作破釜沉舟之北伐，亦未能如願。蔣校長則要求孫先生即回廣州。孫先生終於改變初衷，而於十月十三日回到廣州云云。（永敬按：此段敘述顯有錯誤）十四及十五日，商團事件發展至最高潮，在孫先生的允許下，將商團軍救平。

十一月十三日孫先生離粵乘海輪北上，經上海、日本、天津而至北京。鮑氏隨行。十一月二十二日孫自上海往日本，鮑則由上海逕往北京。鮑氏隨孫北上的原因，著者亦作了多方面的推測與分析。

1925年二、三月間，當孫先生在北京病危之際，對於領導中國革命的繼承人選以及革命的根據地的選擇問題，加拉罕、鮑羅廷與莫斯科之間，自費一番斟酌，馮玉祥及中共，均是列入考慮的對象。不過尚難確定。迨孫先生去世之日，廣東的情況卻大有轉機，蔣校長揮指的東征軍，擊敗了盤踞東江已久的陳炯明叛軍，顯示廣

州的革命情勢大有可爲。鮑乃不待孫先生的喪禮，即返廣州。

12. 勝利而非成功：孫中山先生逝世後，關於繼承人的人選，在鮑之觀點中，論實力與聲望，應屬胡漢民，但胡難與合作；論政治關係，應屬廖仲愷，但在國民黨內，廖一向被視爲理財的專家；至於汪精衛，雖有其缺點，但其聲望與胡相當，其優柔性格，較爲易與。

五月中，廖仲愷前往汕頭，商討今後黨政負責人選，顯爲鮑之安排。汕頭於三月初爲東征軍所克服，時在汕頭者有蔣校長、許崇智、汪精衛、朱培德等，商定了一項政府改組的計劃。當六月中，東征軍回師平定楊、劉之滇桂軍的叛亂後，前項計劃即付諸實施。在大元帥改組爲國民政府的措施下，胡漢民解除代理大元帥的職務，以汪爲國民政府主席，實權在廖之手，胡任外交部長。

廣州革命政府改組後，鮑之權勢日隆。所有決策在形式上出於國民黨新的少數領袖，實際則爲鮑的決定，並由鮑指使中共人員譚平山執行之。

由於鮑之權勢日盛，當然也受到許多批評，大家稱之爲『廣州的獨裁者』(dictator of Canton)。另一方面，也有人批評他的成就是有限制的。即以1925年中的廣州情況而言，其古老的面貌，並無多大的改變。

廣州之融入革命的洪爐，是受上海『五卅』事件的影響。當此事件發生時，全國各大城市均有強烈的反應，惟廣州則待楊、劉滇桂軍的事變平定以後，至六月二十一日始有示威的行動，乃有二十三日『沙基慘案』的發生。鮑藉此事件，提議對香港實行封鎖，是爲有名的『省港罷工』運動，省港罷工委員會在急進的海員工會領導下，成爲廣州的『第二政府』。此時廣州謠言紛起，反共的言論亦相對的發生，有的公然主張刺殺汪、廖、鮑諸人。八月二十日廖案終於不幸發生。鮑又藉廖案進行一連串的『整肅』。使廣州革命政府的地位爲之鞏固，而鮑之權勢亦隨之加強。這些措施，從表面觀之，則是鮑的勝利；但亦引起更多的反對，最顯著者有1925年二月孫文主義學會的成立與共派青年軍人聯合會之對抗，以及同年十一月西山會議的發生。鮑對西山會議的反應，則是1926年一月在廣州舉行的國民黨二全大會所作的決定與措施。鮑在這次大會中，扮演了主宰的角色。

鮑氏權勢的擴張，亦具有潛在性的危險，如列強的干涉；中共實力未充，尙難領導中國走向羣眾的革命；缺乏羣眾的支持，更無忠實的夥伴；汪雖聽話，但非強有力的人物。蔣先生有實力，但不能接受鮑之觀念，且爲反共的同志所擁護。鮑之地位顯然孤單而暴露。

13. 支持廣州：1926年初，莫斯科一批高級官員所組成的來華考察團到達北京，以了解並討論中國今後的革命策略，鮑於二月初前往北京會晤並報告廣州方面的情況。在討論中國的今後革命策略時，有兩派不同的意見，一派主張從速北伐；一派認為北伐為時過早，應在廣州繼續加強政治工作，需要訓練像黃埔那樣更多的軍隊，在一年或二年之內始可實行北伐，且須緩慢的進展，俾使每一佔領區的政治工作得以鞏固。鮑之意見與後者接近。他提出北伐工作所需的步驟：政治與經濟的改革；強化國民黨中的左派；加強農工運動；中共進一步的布爾什維克化；提高軍隊中左傾的情操。惟正當蘇俄考察團完成其任務時，廣州卻發生了『三月二十』事件。

『三月二十』事件發生後，鮑與加拉罕對於蔣先生的態度曾作研判，認為尚可挽救。前所擬議之北伐策略仍屬可行。蘇俄考察團團長巴布諾夫（A. S. Bubnov）主張繼續支援馮玉祥。此時馮在北京為張作霖所逼，退往內蒙，渴求俄援，並擬赴俄。故鮑在返粵途中特往張家口與馮會晤。鮑勸馮應留在國內率領其軍隊，組織一個臨時政府，爭取羣眾支持，與廣州聯絡。馮仍堅持前往莫斯科。

鮑於四月底回到廣州，與蔣先生達成協議，通過黨務整理案。著者曾列舉事實，指出鮑對蔣先生多所遷就，如五月間俄船運至廣州的一批軍械，中共要求分配一部分，為鮑氏所拒；汪自鮑氏回粵後，仍希望恢復一些職權，鮑告以無濟於事。五月中，俄軍事顧問加倫將軍重返廣州，以支援蔣先生的北伐計劃。

『三月二十』事件，改變了廣州與莫斯科之間的關係，共產國際對華影響漸趨式微，而鮑之職責，則純係代表史大林以執行對華政策。

14. 北伐：國民革命軍在總司令蔣中正先生的指揮下，於1926年七月自廣州出師北伐，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但宣傳工作卻為共黨所掌握。九月初，北伐軍的勢力到達長江流域。

在北伐軍進行之際，鮑在廣州的行動，卻帶來了蔣總司令極大的困擾。蔣先生在前線，鮑在後方與風作浪，在廣州成立一個聯席會議，以取代蔣先生所主持的中央政治會議。聯席會議由七名委員所構成，鮑為委員之一。鮑與其支持者迅將此一會議轉變為左派的機構。十月十九日，在鮑的指導下，召開一項國民黨的聯席會議，有六十名代表參加，大多為左派，其中也有廣州國民政府的幾位部長。會議通過的議案，較之國民黨二全大會的更為急進，其中有二五減稅案，農民武裝自衛隊的建立，54小時工作週的要求，強制的仲裁，迎汪復職，慰問由俄返國的馮玉祥。

以布爾什維克的標準言，算是緩和的計劃；但已超越孫中山先生的遺命，也是無恥的反蔣 (unblushingly anti-Chiang)。

在左派把持下的廣州政府，對蘇俄『十月革命』紀念日的慶賀，表現的情緒非常熱烈。公布十一月七日為全國共同假日，所有商店及工廠均行休假，全市滿懸蘇俄國旗，列寧與中山先生的照片到處皆是，街頭巷尾遍設宣傳講台，每一工會、農會以及社團均有其中心，強調實現俄國革命及中俄永久聯合的必要。鮑在當晚的一項盛大宴會中發表演說，所有當地報紙均有刊載。

從表面觀之，廣州似已成爲共產社會；但實際上，反共的勢力卻在增長中。同時，蔣總司令在出師北伐時，對廣州基地亦做了許多安全的措施，使鮑之陰謀難以得逞。鮑在廣州似難久留。

當十一月初北伐軍克復南昌後，鮑氏即與政府一些重要官員離粵北上。同行者約有三十名官員和幾百名衛隊，經過艱苦的旅程，到達革命軍總司令部所在地的南昌。鮑要求蔣總司令遷駐武漢。蔣總司令允於十二月五日至八日在牯嶺舉行會議，商討遷都武漢問題，但無結果。鮑與其同伴包括交通部長孫科、外交部長陳友仁、財政部長宋子文、司法部長徐謙等要人逕往武漢。時武漢在唐生智軍隊及左派的影響下，對於鮑氏的到來，大表歡迎。惟鮑在極度的興奮之餘，亦保持其冷靜的警覺。

15. 武漢的經驗：急進主義流入武漢，工人遊行罷工，無日無之。中共以國民黨的名義派遣煽動及宣傳人員企圖指揮羣眾，有時固屬成功，但亦有其限度。煽動羣眾起而暴動易，但要控制羣眾則非易事。當鮑抵武漢時，此種羣眾運動已越出控制。

鮑抵武漢後，對於蔣總司令顯然無所顧忌，遂於十二月十四日成立一個聯席會議，以行使最高的職權。故當廣州政府第二批北遷人員經過南昌時，遂應蔣總司令的要求，停留南昌。形成南昌與武漢對峙之局。

隨著鮑抵武漢後的數週，急進主義的散佈，造成社會的不安。鮑氏引以爲憂，深知如果暴動繼續下去，不僅要造成經濟的困難，且將召致外國的干涉。然武漢地區排外情緒之高升，肇因於天津及上海的英租界當局對國民黨之鎮壓。尤其是天津英租界當局拘捕了十七名國民黨員，將之引渡給軍閥張作霖，其中有七名被殺。此事激起了武漢民眾反英的高潮。因有1927年一月三日漢口英租界衝突事件的發生，中國則因此收回了漢口英租界。

漢口英租界事件，似非在國民黨方面所控制之下的行動。接管英租界，亦非鮑之所願。但鮑卻以此為藉口，來建立其新政權於武漢。利用羣眾的要求，要蔣總司令移節武漢。蔣總司令則要鮑移南昌。最後蔣總司令同意去武漢商量政府地址問題，未能獲致協議。武漢在鮑與唐生智的控制下，公然與蔣總司令為敵。

蔣總司令回到南昌後，目標不再釘住武漢，乃轉向上海及其他的外國政府。由於策略上的成功，獲致廣泛的支持，而鮑顯居下風。

三月間，國民黨的中全會在鮑的指揮下在武漢舉行。主要作用，實為反蔣。而蔣總司令則於此時集中精力攻取滬寧，俄顧問加倫將軍不再隨同蔣總司令的行動而逕返武漢。此事意味鮑與蔣總司令之間已處於決裂的狀態。惟加倫將軍則指派他的一位同志哈邁夫（A. A. Khmelev）在上海主持內部的起義。當革命軍進抵上海市郊時，哈指揮下的上海工人大暴動，於三月二十二日佔領了上海。莫斯科為此熱烈的慶祝上海的勝利。惟不言共黨領導的工人革命，而說是在蔣總司令領導下的革命軍的偉大勝利。著者認為這是史大林仍在支持蔣總司令的明智之表示。

蔣總司令到上海後，即對共黨所構成的威脅，展開處置的準備和行動。同時北京俄國大使館在四月六日被搜查。漢口亦在四月三日發生日本水兵登陸槍殺華人事件。鮑氏處境面臨內外交困，有人勸鮑應與蔣總司令結束歧見，但是已不可能。四月八日夜間，武漢方面決定派遣兩個軍的兵力，以遷都為由，準備進取南京，以解除蔣總司令的武裝。次日又決定停止行動，以待汪到武漢後再作決定。

**16. 不破的真理：**1927年四月十二日蔣總司令在上海開始清黨，驅除在東南地區活動的共黨份子。武漢政府的人員對此事件充滿忿怒與驚慌。鮑視為此乃中國資產階級與西方殖民主義者對他們的不滿而採取的聯合進攻。為了避免武漢受到同樣的干涉，必須緩和這種因素。鮑因於四月二十日提出他的退卻策略。

鮑對所謂資產階級及帝國主義者雖然求取妥協，但對蔣總司令則取攻擊的姿態。除宣傳反蔣外，別無他法以制之。為解決武漢的困境，鮑與新到武漢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持以不同的意見。羅易主張在兩湖地區實行土地革命，以求革命之「深入」；鮑主張軍事北進，與西北馮玉祥會師中原，以求革命之「廣大」。羅易將其意見向莫斯科請示。史大林自上海四月十二日的事件後，為保護其本身，覆電兩者同時併進，既須「深入」，又要「廣大」。但武漢實行者，卻為鮑之策略。

武漢之經濟恐慌日益嚴重，加以軍事北伐，需款迫切。由於工人罷工，工商歇業，工人失業者達二十萬人以上。鮑原實行之現金集中政策，迫使資金逃避。以致

稅收銳減，乃大量發行紙幣，造成通貨膨脹。外界對於武漢，更是謠言紛起。此時鮑氏本人亦頻遭不幸，彼自廣州北上以來，苦於虐疾；復以騎馬失足，摔斷左臂；其妻法尼亞（Fanya）在二月間自上海乘船來武漢途中，在南京被北軍張作霖部拘捕，送往北京，下落不明。在此內外交困之下，鮑每日仍須工作八小時以上。經常接受來自歐美各國新聞記者的訪問；但甚少談及其私人問題。當記者問其私人有關情況時，彼必答以：「我來自雪地，而生於陽光。」「乏善可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夏斗寅師自宜昌進攻武漢，繼有許克祥團在長沙的反共事件，帶來武漢極大的震動。史大林根據鮑對兩湖事件的電報，發出電令，要武漢武裝工農及中共軍，沒收土地，審判反共的軍官，改組武漢國民黨中央，加入農工份子。著者認為史大林這一電令，在為保護自己，並非要鮑認真的去執行。不論如何，當史大林的電令到達武漢時，所有在武漢的中俄共，甚至包括羅易在內，無不啼笑皆非。經過討論，決以中共中央的名義，電覆史大林，謂已奉到命令，將儘可能去做。但羅易頗欲藉此電令以達其革命「深入」的想法，試圖勸鮑試行，被拒。羅易認為汪精衛或能贊同他的想法，乃將此電示汪。汪大為驚異。羅易的做法，反而加速了汪及其他國民黨人的右傾。

**17. 返國：**史大林的電令，羅易的莽撞，使武漢陷於絕望中。此時無論是武漢的俄國人，中共人員，以及國民黨左派，無不寄望於西北馮玉祥的支持。蓋武漢北伐軍不惜以重大的犧牲，擊敗北軍張作霖部，與馮會師河南的鄭州後，武漢要員急於要和馮會晤。因有六月十日鄭州會議的舉行。會中決定河南、甘肅、陝西等歸馮統轄。同意馮的建議，允許中共退出武漢政府，遣鮑回俄。武漢北伐軍撤回兩湖。汪於六月十三日由鄭州到武漢時，曾受到盛大的歡迎，宣稱鄭州會議的成功；但對中共及鮑的問題，則未宣佈。鮑被私下勸告回俄，雖在意料之中，但他擔心他的太太法尼亞尚在張作霖的扣押中，希望暫留武漢等待結果，遂被允許。

馮在鄭州會議後，又與蔣總司令在徐州舉行會議，馮對南京方面雖無好感，但他深知南京有外國的支持，有充分的經費；更謠傳南京與張作霖正在進行協商，如係事實，當是一大威脅。南京方面，則是希望馮能表明反共的態度。此一會議的結果，雙方各如所願。最重要者由馮發電警告武漢要人，要他們和共黨分離，送鮑回俄。

鮑對馮的電報初抱一線希望，以為此電發自南京，未必真實。迨其會晤由徐州來訪的瑞典籍的記者尼爾遜（Aag Krarup-Nielsen）核對所持的電文完全相同後，

始確信馮已明確的採取反對武漢及其本人的行動。

鄭州會議後，鮑之回俄，已成定局。其尚未即刻離去者，一為採取安全的路線，一為等待其妻的消息。一直到七月十二日，得知其妻在北京被釋放後，始決定取道外蒙回俄。由於唐生智所部軍長何鍵在武漢反共，鮑暫時轉江西的廬山。陪伴者有宋子文和瞿秋白。七月末，鮑由廬山回武漢，反共勢張，鮑匿宋子文寓。二十三日將其任華任務交給新來武漢的一位青年專使羅明那滋(Georgian Besso Lominadze)。二十七日自武漢乘專車北去。

**19. 事實 (Reality)：**本章著者以極多篇幅敘述鮑妻法尼亞在北京被釋回俄的故事，以及鮑離武漢後經過馮玉祥的西北防區回到俄國的艱苦旅程。鮑自七月二十七日離開武漢後，即到鄭州。適中共在南昌暴動的消息傳來，武漢致電馮玉祥，要求將鮑扣留。但馮決定允鮑離去，並予保護。鮑於八月三日離鄭州，當日抵陝州，此為當時隴海路的終點。鮑一行三十人連同攜帶的物品共換乘十輛汽車。由於天雨及道路不良，車行極緩。八月十二日抵寧夏。在旅途中，鮑苦於瘧疾，心情惡劣，精神頗不穩定。留寧夏十六天，準備渡過沙漠之所需。九月五日離寧夏，越過漫長的大沙漠，到達庫倫。受到外蒙當局的歡迎與接待。在此停留兩週，應邀向蒙古人民革命黨召開的第六次代表大會致詞，說明中國革命的經過。指出中國革命之分裂，乃是由於所謂資產階級、地主、軍閥的反對社會主義，造成國民黨的分裂。其失敗原因乃是中共未能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

鮑於十月末回到莫斯科後，行動即受限制，沒有工作。此時由中國來俄的武漢人物如陳友仁、宋慶齡等原以鮑為靠山，頗覺氣氛不對，各自離去。

鮑在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在1929年一月的「陳獨秀主義的歷史背景」討論會中，鮑被邀出席，受到嚴厲的批評，承認錯誤。從此鮑對中國問題，諱莫如深。

**19. 餘生：**1929年中，中國問題的爭論告一段落，鮑有了職業，擔任Bumprom公司的副主任，似為研究印度的革命。由於表現不佳，被調為次要的職務。1930年任職於工人部(People's Commissariat of Labor)，此為比較好一點的工作。1932年任「莫斯科日報」(Moscow Daily News)主編，此為鮑在其餘生中較為愉快的工作。

二次大戰期間，鮑仍監督莫斯科日報，並在蘇俄新聞局擔任一名官員，負責接待來訪莫斯科的外國記者。1949年一、二月間在莫斯科被捕，被禁在葉庫次克

(Yakutsk) 附近一個最惡劣的監獄中，死於 1951 年五月二十九日。著者分析鮑之被捕有間接的和直接的兩個原因：間接的原因，是史大林對猶太人在戰後民族主義的增長感到不安；直接的原因，是鮑在武漢時期即交往的一位美國的左傾新聞記者 Anna Louise Strong 爲了報導中共勝利的一本著作的出版問題，爲史大林所忌，鮑從中調解，牽連了鮑的被捕。

## 二、評論部分

1. 本書對鮑羅廷的一生，在資料難求的情況下，作一完整的記述，是其難能可貴之處。尤其重要的，著者對於鮑之晚年生活及其最後的不幸遭遇，有較詳細的描述，實爲過去所不可多見的。蓋過去有關幾種鮑羅廷的研究，多集中於鮑與中國的關係方面。本書雖然也以鮑在中國的活動爲其主要內容，但對鮑來中國之前及其離華以後的歷史，作了清楚的交待，足以顯示著者對鮑之研究，有其獨到與突出之處。

2. 本書另一突出之處，是其所據之資料，以俄文的資料爲主。儘管著者在本書最後部分所列的主要資料，包括英文、中文及俄文方面，而其實際引用者，則以俄文爲多。本書主要資料分類如下：(1)檔案及收藏11種；(2)論文及小冊子 100 種，其中俄文者 30 種；(3)書籍 205 種，其中俄文的 88 種；(4)報紙及雜誌 21 種，年代係從 1906-1948 年間的，1920年代的占 15 種；(5)未出版的書稿 10 種。以上所列資料計三百種以上，頗多珍貴文獻及具有水準的著作，如芝加哥當地的報刊，對於鮑自 1908-1918 之間在芝加哥的活動及其對俄國革命的態度，即提供了極多而重要的資料；倫敦內務部的鮑羅廷檔，華盛頓國務院檔，以及法爾帕萊梭大學(Valparaiso University) 當年的檔案等，著者均曾加以利用，如本書中的插圖之一有 1919 鮑赴美國的簽證，有鮑之照片及簽名，頗有意義。足以顯示著者對原始資料的重視與搜集之勤。

3. 儘管著者在其主要資料目錄中列有爲數可觀的著作及文獻，但也有必須參考的著作而被遺漏的，如 1976 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韋慕庭(C. Martin Wilbur) 教授所著「孫逸仙」(*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一書，就被忽略。著者在其書中討論到鮑在廣州的一切活動，諸如鮑與孫中山先生的關係；鮑與國民黨改組的關係；商團事件；省港罷工等問題，在韋著「孫逸仙」一書中，都曾作深入探



討。而著者在「鮑羅廷」一書中的相關問題上，沒有任何一點加以參證。同時著者所列的三百餘種的主要資料中，實際參證者恐為數不多。最低限度，有許多列入的著作，並不在其註文（notes）之內，例如陳福霖教授所撰的「廖仲愷」（Fook-lam Gilbert, Chan, Liao Chung-K'ai, 1978-1925, *The Career of a Chinese Revolutionary*），雖經著者列入其主要資料中，但在全書的註文中，卻未發現有引證之處。要講到鮑與廖的關係，廖在孫、鮑之間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廖被刺事件等，又怎能忽略陳撰「廖仲愷」一文呢？例如本書的第十二章「勝利而非成功」（Victory Without Success）的內容，主要是涉及廖與鮑的關係，而著者在本章的八個註文中，沒有任何一個是有關研究廖的專著或廖氏本人的直接文獻。一般而言，各章之後的註文，均嫌簡略。有時全章只有一個註文。就顯得本書的撰寫不够嚴謹了。

4. 本書的內容，以鮑在中國的活動為主，有許多事實或問題，必須參證中文的著作或資料，方能加以證實。而著者在其主要資料中雖列有少數中文的著作，但實際上並未參證。因此即有許多事實並非如著作那樣的「假定」或「推測」。例如著者在本書的第九章「去廣州」（To Canton）強調鮑與孫先生關係的轉變，實以1923年十一月十八日那天鮑對孫的勸告為其關鍵；並強調鮑在廣州危機中所作的貢獻。關於孫先生在陳炯明叛軍這天進入廣州市郊的危機中有出走的打算，著者是根據當時在廣州擔任軍事顧問俄人趙列潘諾夫（A. I. Cherepanov）多年以後的回憶。謂在這天（趙回憶錄記在這天的下午），鮑與孫先生見面，孫作離開廣州的打算，鮑氏勸其留下。迨廣州轉危為安，孫對鮑之態度大為轉變，從此鮑對孫的影響力，大有增進。著者這一「推測」，顯與事實有所出入。按十一月十八日廣州危機之挽救，是由這天上午十時左右豫軍樊鍾秀部由韶關率部抵廣州，使廣州的危難大有轉機。記述當時廣州危機的原始資料，有當時指揮作戰的參謀長李烈鈞所編之「孫大元帥戡亂記」（1924年參謀本部編印，廣州）一書，此書在黨史會出版之「國父年譜」曾充分引用。此外，更有當時在廣州的黃季陸先生詳知此一危機的內容，撰有「赴義恐後的英雄」（臺北傳記文學6卷6期，1965年6月號），即為記述豫軍樊鍾秀部赴廣州的經過。「國父年譜」亦曾引用。綜合以上資料，當日廣州的情況和孫先生的動態是這樣的：十八日午前十時，敵騎進犯廣州，粵、桂聯軍退至燕塘（廣州附近）。時豫軍總司令樊鍾秀率部抵廣州，孫先生即令樊部增援。豫軍經長提出發，子彈、糧秣皆由軍士自負，軍容整肅，士卒強勁，樊率精銳先行，據

東山，而敵軍至，樊縱兵擊之。會旅長朱淮由沙河側攻，永豐艦由海岸掃射，三面兜勦，大破敵軍，逐至車陂外，激戰於火爐山，此為龍眼洞東方之重要陣地，敵堅守之。（以上是據李烈鈞書）黃季陸先生的回憶云：是役豫軍樊鍾秀部作戰最勇，戰果尤著。樊自北軍起義來歸，駐韶關，廣州危急時奉命開抵廣州，行裝甫御，即率部跑步開往廣九車站增援。孫先生聞之，趕赴車站慰問，並欲隨軍殺敵。在場官兵堅請孫先生回駕。孫先生仍留廣九車站。樊軍即分批衝向敵軍。迨勝利消息傳來，孫先生始回大本營。（以上記述見國父年譜 1030-1031 頁）以當時的情況來看，孫既要求親赴前線殺敵，而且危機已漸和緩，始回大本營，何至有出走的打算呢？本人復就此事向黃先生請教。黃堅稱孫先生決無出走的打算。就過去陳炯明的叛變而佔據廣州，孫先生尚在永豐軍艦上苦守五十多天（由1922年6月16日守至8月9日）一事來看孫先生的性格，亦不可能在十一月十八日有出走的打算。廣州危機後的兩週，孫先生在歡宴各軍將領的演講中，亦盛讚豫軍樊鍾秀的貢獻，孫先生指出：「上（十一）月十七日（應為十八日），陳家叛軍打到石碑，廣州人心便非常搖動，幾乎有不能保守的現象。那天豫軍湊巧已趕到廣州，便由黃涉步行，經過長堤到廣九車站，當時趕上前線增援，把敵人打退。人民見過了豫軍軍容之盛，便異常鎮定。」（見「國父全集」第二冊 567 頁，黨史會 1973 年版）如同孫先生本人所指，這天廣州人民因豫軍到來，尚且「異常鎮定」，孫先生何能獨走？更何能捨棄勇敢的豫軍而不顧？

5. 由於著者過於強調鮑對孫先生的影響，認為自十一月十八日廣州危機以後，孫對鮑信任有加，曾有一次警告反對鮑氏的國民黨人有云：「如果你們不與共黨合作，如果國民黨員參加反對此項合作，我即棄絕國民黨而加入共產黨。」（原書 126 頁）著者僅根據俄人艾莫謝夫（I. Ermashev）1964 年在莫斯科所撰「孫逸仙」一書，其他別無旁證。這樣嚴重的一段話，出自多年以後一個俄國人的說法，著者遽加採信，這是有待商榷的。孫、鮑關係的轉變，既非如著者所強調的十一月十八日之事，由此而產生的一切推測，自亦值得懷疑。按孫先生當時對於黨內同志之反對聯俄容共者所作的解釋，都是本諸他本人所著三民主義的觀點，以及國民黨與國民革命的立場；對於馬克思主義及共產黨的思想，亦不時批評其錯誤。聯俄是為爭取蘇俄對國民黨及國民革命的援助；容共是要中共人員服從他的三民主義，他不承認共產黨對國民黨有對等的地位，故行「容共」政策，而不稱之為「合作」（Cooperation）。例如 1923 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孫先生親自主持下的一次國民黨臨時

中央執行委員會議中，即可能因鮑所提出的農工法案而召致國民黨同志的異議，而作一項決議有云：「在黨綱中增加一段：所謂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倡之吾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故其內容解釋，當以孫中山先生之說爲斷。今依次序而舉其概略。」

（見「國父年譜」1032頁）又如孫先生在1923年十二月二月親筆批答一位華僑同志鄧澤如揭發鮑及中共陳獨秀的陰謀呈文中說：「陳獨秀等之共產黨，既參加吾黨，自應與吾黨一致動作；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見「國父年譜」1037頁）這是孫先生認爲中共如不服從國民黨，他將棄絕共產黨。俄人艾莫謝夫反指孫先生要棄絕國民黨，真是把事實顛倒過來了。本人亦曾就著者所引艾莫謝夫的一段話，就教於當年參與反共的黃季陸先生，黃堅稱：孫先生決未說過什麼「棄絕國民黨而加入共產黨」的話。孫先生且告知反對聯俄的同志說：「今意大利已承認蘇俄，英亦承認之；我爲何不能聯俄！否則，俄與西方列強協以謀我，我將何以自處！」

6. 關於1926到1927年間的武漢羣眾暴動問題，尤其是狂烈的排外行動，是否由鮑煽動而起？著者似乎認爲鮑氏並不贊成羣眾的排外的行動。事實上，武漢羣眾之排外行動，特別是反英運動，實自1926年底鮑到武漢以後，由於鮑之提議而指揮煽動羣眾所展開者。煽動的藉口，是鮑利用天津英租界當局拘捕國民黨人（其中主要一名爲中共份子江浩之子江鎮寰）並引渡給張作霖事，於1926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鮑在武漢聯席會議中聽取天津黨部的代表報告後，即提出他的反英辦法，重要者要在武漢舉行反英大會，並應有以下各項運動：(1)對英經濟絕交及其他必要的報復手段；(2)人民要求時，對英、法在中國內的宣傳者，亦可拘捕之；(3)通知各地黨部，召集羣眾大會，提出民眾的抗議；(4)由政治部通告各軍隊，說明不能忍受此種耻辱，並不能坐視同志被捕殺，同時通知國民軍（馮玉祥部）作同樣動作。十二月二十六日，即有「武昌市民反英運動委員會」在該市閱馬廠集會，到會者有二百餘個團體，羣眾十萬人以上。大會被描寫：「對英帝國主義之種種暴行，異常憤激，各界演說慷慨激昂，大都有滅此朝食之慨。」通過反英決議案十四項之多，正是鮑所提議的翻版，其中有如：「援助天津被捕國民黨黨員，請國民政府向英、法政府抗議，並限令即日釋放；如不釋放，請政府將無故戒嚴、擾亂武漢秩序之英、法人，各捕十人押禁。並籌備全國追悼天津、開封、南京被難同志大會。」又如「實行對英經濟絕交，於必要時，各界聯合檢查英國貨物。」以及「反對漢口英租界無故戒嚴，擾亂武漢秩序」等。（以上見拙著「鮑羅廷與武漢政權」94-96頁）從這些事實看來，武漢地區羣眾的暴動及其排外行動，鮑實陰謀主使者。

7. 以上是本人對 Jacobs 教授所著「鮑羅廷」一書的部份意見。此外，本書也有一些小的錯誤，如 126 頁著者謂孫中山先生於 1924 年十月十三日自韶關回廣州，實為十月三十日之誤。日期既誤，著者所推測孫回粵的原因，當然亦屬多餘的了。又如 273 頁 Hunan 的洛陽，實為河南 (Honan)；又 275 頁唐生智南下鎮壓 Honan 的過激活動，應為湖南 (Hunan)。

本人雖對本書有不同的意見，但著者 Jacobs 教授對鮑羅廷研究所作的積極貢獻，仍然是無可置疑的。